

# 中国“非虚构返乡书写”的困境与契机

## ——以“梁庄三部曲”为中心

吴琼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在“梁庄三部曲”中, 梁鸿以知识分子返乡者的姿态, 讲述了当代乡土中国的故事, 并形塑了当代中国“非虚构返乡书写”的重要主题模式。通过“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进入真实的乡土空间, 梁鸿获得了再次讲述“乡土中国”的可能。但也正由于在乡土文学的知识框架中观察和书写这个“当代乡土中国的样本”, “梁庄三部曲”并未真正提供讲述“乡土中国”故事的新范式, 而只是将“乡愁”问题化。不论是梁鸿还是其他知识分子的“非虚构返乡书写”的作品, 都陷入了相似的困境。这一困境为作为问题的“乡土叙事”提供了反思的入口, 也成为“非虚构写作”从人文学知识框架出发, 探寻更多文类可能的契机。

**[关键词]** 非虚构写作; 梁鸿; 返乡书写; 乡土中国

**[中图分类号]** I 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5) 03-0078-07

在中国讨论“非虚构写作”必须提到的作品便是梁鸿的“梁庄三部曲”, 从2010年“非虚构写作”概念在中国文坛初兴之时适时出现的《梁庄》(出版时更名为《中国在梁庄》)、2013年出版的续集《出梁庄记》到2021年出版的《梁庄十年》, 由这位人文知识分子返乡开启的“梁庄系列”拥有了一个暂时的“尾声”, 由此也完整地呈现了中国文坛对“非虚构写作”的期待与想象。2010年《中国在梁庄》成书后出版, 先后获得了“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天津图书奖”等十余项重要文学类和图书类奖项。“人民文学奖”将首个非虚构作品奖颁给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也说明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示范性意义。“梁庄系列”深入乡土社会的田野调查姿态与具有症候性的记录应和了《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计划”所说的宗旨: “以‘吾土吾民’的情怀, 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 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 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sup>[1]</sup>。从革新“当代文学”的意义来说, “非虚构写作”的提

出意在重新唤起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在与“非虚构写作”的相关诉求中, 与“文学性”的“技术处理”相比, “真实性”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 当《中国在梁庄》首次出现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时, 评论界对于这种亲历者讲述的返乡经验给予了大量的肯定和褒扬。但另一方面, “梁庄三部曲”在面对“故乡/乡土”时, 依旧无法走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书写乡土中国的典型范式。它将启蒙主义式的话语范式用于分析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 进而创造关于“农村现实”的真实氛围, 这一感性的问题化叙事实际仍然在传统的文学视野以及人文学知识体系之内。讲述“乡土中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 这一主题不断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现代性逻辑中被复述, 由此成为“乡土书写”的理论套话。正是在此意义上“非虚构返乡书写”不仅提供了重构“乡土中国叙事”的新形式, 也成为反思传统乡土叙事范式的契机。

**[收稿日期]** 2023-07-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30—1940年代西方人的延安书写与西方中国观研究”(20CZW055)

**[作者简介]** 吴琼(1990—), 女, 江西临川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 一、“问题化”的“乡愁”叙事

在《中国在梁庄》的开头，梁鸿首先表达了城市生活以及高校研究工作所带来的精神匮乏的忧虑以及某种“寻根式”的渴望，这种渴望很自然地指向了“大地/故乡”的文化情结，而这深沉的“乡愁”也成为梁鸿重新回归乡野的动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sup>[2]ix</sup>。因此，梁鸿利用2008年、2009年的寒暑假重新回到河南老家梁庄，试图重新建立与故乡的联系。通过田野调查、访谈等方式，对村庄的自然环境、人口结构、宗族关系、政治权力体系进行详细了解和调查，并依此将梁庄人的生活和梁庄发生的故事以网状结构铺陈开来。家乡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坑塘和河流等水源的破坏、农村教育的衰败、酿下大错的王家少年和五奶奶落水身亡的孙儿揭开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血淋淋的伤疤等等，都是梁鸿结构非虚构文本的重要线索和依据。

在2010年《中国在梁庄》初版的目录中，梁鸿用极具文学意味的方式指出了梁庄作为乡土的整体以及每个梁庄个体所遭遇的困境，并将这些困境作为“乡土中国”的问题标示出来。目录共分为8个章节，标题分别为：“我的故乡是梁庄”“蓬勃的‘废墟村庄’”“今天的‘救救孩子’”“离乡出走的理想青年”“守在地上的成年闰土”“被围困的乡村政治”“农村的‘新道德’之忧”“乡村的未来梦想”，从章节的命名中可以看出，梁鸿有意识地将复杂纠缠的农村见闻分列成8个不同的问题面向，作为“中国的病灶和悲伤”<sup>[2]ix</sup>，也作为梁庄必须直面的现状。在梁鸿的“梁庄书写”中，关于“梁庄”的讲述始终有着晦暗的底色，或许是认为初版的章节目录过于感性，梁鸿后来修改了部分目录的表述，让作品的整体叙事结构更加清晰地指向了

“梁庄”背后所隐喻的“当代乡土中国”。最后一章“乡村的未来梦想”改为了“何处是故乡”，从这些细节的转变可以看出梁鸿尝试不断调整其在非虚构作品中的写作姿态，她的非虚构返乡书写为读者提供一个重新看见“乡土中国”的路径——散点式呈现的真实见闻、当代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以及隐于其后的村庄历史被容纳进一个总体性的叙事之中。这种写作手法是“非虚构写作”快速获得时空纵深的方式，也是能够讲一个多重维度的“中国故事”的捷径。梁鸿的写作看似缘起于对“不及物”的学术生活的厌倦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但这一颇有哲学意味的命题一方面被转化为对“故乡”这个代表生命之初的纯粹象征的感性诉求，另一方面又很巧妙地为关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所替代。

在《中国在梁庄》出版之后，梁鸿用2年时间走访了分布在中国各地的300余位梁庄老乡，通过他们走出梁庄后在各地迁徙流转的打工和生活经历来探讨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变革，《出梁庄记》由此诞生。虽然农村社会乃至传统农耕文化体系处在现代时空的边缘，但新一代农村人代表了当代城乡结构变革中最重要的变动因素。梁鸿显然意识到她的写作意味着一次历史性的观照：“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sup>[2]xii</sup>在重新构筑“当代乡土中国形象”的尝试中，梁鸿在结构的完整性上前进了一步。她的《出梁庄记》可以看作《中国在梁庄》的姊妹篇，后者是前者在叙事逻辑上的进一步展开。《出梁庄记》将写作的视野延伸至在全国各地的梁庄打工者，以联结“梁庄”内部的现实与村庄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现实，尝试构成对“城乡现实”的整体性认知，“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sup>[3]1</sup>。但仔细阅读这2部作品就会发现，它们很大一部分是梁庄人的“口述实录”，此外便是梁鸿对村庄和城中村等环境氛围的散文式描述，这些感性描述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乡愁”重新打开——负载回忆光晕的“田园牧歌”与眼前的断壁残垣、杂草丛生

的“衰败农村”之间的强烈对照,由此形成的忧虑情绪很快就使内在于村庄内的“清醒的旁观者”转向关于社会问题的讲述。换言之,“非虚构返乡书写”其实就是写作者将“农村现实”问题化的过程。

2021年,“梁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梁庄十年》再次唤回了读者对于“梁庄”的记忆。10年后再次讲述关于梁庄的故事,梁鸿选择了一种新的写作视角,她尽力地隐藏在文本中,从不同侧面讲述“返乡者”的乡土书写背后应具有的问题逻辑。这次梁鸿选择重新演绎10年中村庄的变化、梁庄老人、女性以及梁庄后辈的生命经验。一方面,她尽量隐去自己的主观评述;另一方面,她力图将梁庄代人所形成的“生命长河”背后的时空维度共同置入“梁庄”的有机体之中,“从结构而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他们的出生、成长、死亡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其次,也会把‘梁庄’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某一座房屋,某一处花园,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都值得细细道来”<sup>[4]233</sup>。梁鸿称之为“看山不是山”到“看山是山”的转变。在这里,结构非虚构叙事的不是单一问题化的“乡愁”,而是以历史化的视野打开关于当代中国的问题场域。梁鸿作为学院内的文学研究者,其研究领域恰是“乡土文学”,因此,在面对“讲述乡土中国的故事”这一课题时,她的写作总是在其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她的农村出身之间纠缠。与此同时,作为亲历者、调查者和记录者,梁鸿所处的位置应该比任何人更为贴近写作的对象,但她却不断地提出其“非虚构写作”之旅是一次“艰难的重返”。因为梁鸿在进入梁庄、书写梁庄之后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离梁庄远去,这种颇为矛盾的情感实际上来自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不断书写和建构的“启蒙”和“寻根”冲动。虽然在《梁庄十年》中,梁鸿以更为克制的方式讲述她与“梁庄”以及梁庄的乡亲们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隐秘的联结,并强调自己看见了“问题”背后的“真实的生命”,但她依旧是在长时段的观察和社会学的考察中来想象“个体”与“梁庄”的关系以及作为文化整体的“梁庄”与“乡土中国”的关系,“中国当

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作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sup>[4]233</sup>。非虚构返乡书写尝试达成的总体化叙事的目标,很显然无法仅仅通过“生命书写”而达到。因此,如何通过叙事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来,是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在探索主题结构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 二、“非虚构”的“真实感”

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曾阐述在中国文坛“非虚构写作”之于“小说”的重要意义:“就《梁庄》而言,最初的反映和直到现在的反应常常都胶着在一点上:人们认为看到了比很多小说更多的‘真实’。……非虚构和虚构,它们都各自有一套应对我们的‘真实感’的策略和伦理,小说的了不起在于,它居然在‘虚假’——‘虚构’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的‘真实’的权威,但现在看来,似乎小说的这种权威性出了问题。”<sup>[5]</sup>也正是由于“小说(虚构文学)的危机”,李敬泽认为“非虚构写作”区别于小说创作之处在于将个人经验、感受、知识融入对“现实”的书写,由于“非虚构写作者/讲述者”视角和认知的有限性,写作也就建立起非虚构的“真实感”<sup>[5]</sup>。单纯从写作方式来看,“梁庄系列”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文类特征,2008年梁鸿返回梁庄并创作乡土纪实作品之时,“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还未出现在文坛。因此,《梁庄》在《人民文学》的出现成为一次极为巧合的指认。正是这次指认,使得“非虚构写作”在当代文坛“道成肉身”,“梁庄书写”提供了“非虚构返乡书写”的典型书写范式。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中,梁鸿一方面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自己写作的“情感纯粹性”,另一方面将“梁庄”的故事放置到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革的大背景中来观察和讲述。作者在此是一位“返乡者”,也是携带着人文科学知识来到农村的学



者，因此，书写“真实的乡土中国”实际是以多重认知结构来共同塑造时空秩序，“书写梁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纪实”，而成为一次文化政治实践。由此赋予了“非虚构”以“不是（非）虚构”的确定证据，使“梁庄”成为一个具有症候性的文化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梁鸿在其“乡土中国”的知识框架中选取了农村社会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例如，书中描述了令人震惊的犯罪案件，梁庄82岁独居的刘老太被残忍杀害，这在现代社会看来触目惊心的罪行经查居然是同村沉默面善的少年所为。梁鸿从案件查办过程入手，依次呈现了梁庄人的反应以及被害老妇的女儿建昆婶愤怒的讲述。王家少年的悲剧很显然是当代农村普遍缺失的家庭教育和道德感所造成的后果，但梁鸿最后以“文学”的方式结束了讨论：“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sup>[2]70-71</sup>与此同时，作为农村社会人口结构崩坏的问题还指向了一批无法离开农村的“留守老人”。这些被称为“成年闰土”的农村中老年男性，如生活在梁庄的精神病人清立、无家可归的祖孙二人、单身汉姜疙瘩的经历都被看作农村变化的见证。这些梁庄人仿佛早已经被遗忘，梁鸿将所有停留在乡土的个体经验重新挖掘清理，通过他们自己和旁人的讲述将这些故事纳入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在此，所有带有感伤情绪和晦暗经验的讲述都将被隐没在关于“乡土/非现代”的想象之中，背后隐含的实际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现代性逻辑。“总体性的历史”会将个体经验的碎片清理出“历史叙事”之外。梁鸿则尝试将这些零散的细节重新捡拾回来，将“现代历史的视野”延伸到活生生的个体，“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感”正源于这种收纳“现实”的方式。

作为“梁庄现实的延伸”，《出梁庄记》是完善乡土现实框架的重要部分，叙事将视线从村庄转移到分布在各地的梁庄的“打工者”，将他

们的经历作为透视进城农民的窗口，将农村的衰败氛围延伸到城市中边缘群体的聚居点，将城中村、出租屋和工厂等迥异于农村的生命空间加以展示。在《出梁庄记》中，虽是以外出打工的梁庄人为主角，但所有人的故事和描述的话题实际都有关“返乡”。梁鸿在这部作品中构筑了一个“环状结构”，她从梁庄出发，在陕西、河南、北京、内蒙古、山东和深圳辗转逗留之后，以“梁庄的春节”作结，农村人在城市始终是不被接纳的“零余者”，他们最终的归宿还是“回到农村”。《梁庄十年》则更多地把视线投向了从城市回归梁庄以及从梁庄离开的梁庄人，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来讲述这些梁庄人的个人史，这些个体生命经验与梁庄有着各种隐秘的联系，由此填补了“梁庄叙事”的历时空间，最终完成了一部“村庄的变迁史”。在李洱的一篇学术随笔中介绍了他所认识的梁鸿和其写作背后的故事，称“目前为众人所知的《中国在梁庄》中的很多故事，最初实际上是要当作小说写的。我就曾多次听她讲过那些故事，活灵活现，纤毫毕见，她只是苦恼于它们如何以小说的形式呈现，苦恼于那些故事如何剪裁，如何形成一个整体，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在她那个时候的文学观念里，‘整体性’是个正面的词，‘碎片化’则是个负面的词。……《中国在梁庄》其实可以看成回忆性散文，差不多是当代酷烈版的《朝花夕拾》。田野考察那是在后面写《出梁庄记》时发展出来的”<sup>[6]</sup>。

梁鸿通过“非虚构写作”所塑造的“真实感”实际上来自新的农村感性经验从“无”到“有”的过程。她试图带领读者观看的是梁庄为何会变成“回不去的故乡”，甚至在情感上的宣泄也并非为当代农村社会的问题寻求解救之途。梁鸿写作的矛盾在于她想将“真实的光晕”笼罩于自己的讲述之上，强势地将情感施加于对“真实”的理解之上。“非虚构写作”在此成为“乡土闲话”的注脚，“梁庄”的境遇代表了中国乡土社会稳定结构的逐步解体，这一变革的过程是所有现代乡土书写都试图处理的命题，“梁庄三部曲”的出现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乡土”这一本质性的存在。作为叙述者的梁鸿也同样认为自己制造的是“真实的氛围”而非真正的

“乡土现实”：“我冒险塑造了一种‘真实’的氛围，把读者带入梁庄，是因为我想达到另一种效果，即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情境、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与你无关，也不是只是在历史深处，而是与你息息相关，在同一时刻之中。”<sup>[2]258</sup>

虽然农村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结构都在悄然变化，但一切故事都能被收容进仅有细微颤动的乡土时空，尔后被掩埋入永恒的大地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讲述“现实”实际是为了编纂“历史”，就如詹姆逊所言：“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sup>[7]</sup>梁鸿通过田野调查、采访实录所编纂的“梁庄历史”成为了“乡土中国”的寓言。梁鸿在《出梁庄记》最后的感慨却道出了她写作的困境，“我终将离梁庄而去”<sup>[2]268</sup>，梁鸿始终未能真正谈论“乡土”，她通过人文学知识架构来观看“梁庄”及其背后的诸多绵延的故事，即使可以跟随着父亲或家族中的兄弟姊妹以“熟人”的姿态到达每个梁庄人的面前，但是她和“梁庄”之间却始终存在隔膜，她始终是掌握知识和讲述权力的“特权者”。对于“非虚构写作”而言，矛盾之处正在于她的身份和知识结构，她对自己写作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梁鸿对写作被一种固化的知识模式所裹挟感到无奈，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代的村庄‘风景’和叙事并没有超出鲁迅那一代的内部逻辑。我们不自觉地按照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去理解并继续塑造乡村生命和精神状态，它已经变为一种知识进入到作家的常识之中。就我自己而言，我总是在模拟一种情感并模仿鲁迅的叙事方式，似乎只有在这样一种叙事中，我才能够自然地面对村庄。”<sup>[2]254-255</sup>中国“非虚构写作”的雄心在于构造书写“真实”的文本，为大众提供关于“当代中国”的认知。但从“非虚构返乡书写”可以看出，“非虚构写作”并非可以单纯通过现实的采录和叙事的编织天然地实现对“真实”的承诺。有学者指出“非虚构写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获取“真实”以及结构这些“真实素材”的方式，这种看似不断突破中国当代文学疆界的行动其实是在建构新的“真实性”与“文学性”融合的形式：“这是一种无法以既有的文学标准加以衡量的美学，它在

美学上的创造性就在于对既有标准的颠覆，从而将以往无法被纳入‘文学’表现范围之内的经验、故事与情感，在一种新的‘文学’范式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从而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心灵形式’，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以及美学的‘当代性’。”<sup>[8]</sup>正如“梁庄书写”不断试图摆脱的知识先见与知识氛围，“非虚构返乡书写”本身实际塑造的是某种关于“真实”的表述，而这恰恰是现代文学形塑的讲述“乡土中国”的方式。

### 三、讲述“乡土中国”的方法

在《出梁庄记》的后记里，梁鸿表达了自己观察者和写作者身份的矛盾和焦虑的心理，“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sup>[3]311</sup>。同时，梁鸿称自己试图弥合大众乃至学界对于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期待，并声明自己对于“非虚构写作”本身并无太多功利的想法，只是想呈现她所感受到的真实的“梁庄”。“《中国在梁庄》里面的情感过于清浅，过于强烈，以至于遮蔽了人物自述部分。这是对的。我在《出梁庄记》中做了一些调整，但这些调整并非出于它要符合‘非虚构写作’的规范，而是因为我确实觉得要保持一些距离”<sup>[9]</sup>。在梁庄系列作品中，梁鸿试图寻找“谈论/想象”当代农村社会的整体性思路，这种寻求总体性的写作方式也成为“非虚构返乡书写”的典型结构模式。

2015年春节，微信朋友圈的“爆款”非虚构作品——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文章《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分享了与梁鸿相似的思考：“‘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sup>[10]</sup>在王磊光随后写就的《呼喊在风中》一书中，这种对农村未来的迷茫和失落几

乎弥漫在所有的叙述中，虽然在这些叙述中也夹杂着对故乡生活风俗的温馨回忆，但这依旧掩盖不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强烈失落感。由于相似的学科知识背景，王磊光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梁庄》的延伸，也成为了“非虚构返乡书写”的注脚。另一篇在2017年的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非虚构返乡书写的作品是同为文学研究者的黄灯所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讲述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在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不幸遭遇，她将自己的农村生活的经验和情感作为观照“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历史境遇的支撑，通过“触碰一个家庭不能碰的秘密”<sup>[11]</sup>，将农村家庭的无声经验放大，并重构其与历史的联结，以此开始一段关于中国农村的历史叙事。由于“非虚构写作”这一新写作范式的介入，梁鸿的“梁庄”、王磊光的“王家湾”、黄灯的“丰三村”，共同承载了“乡土中国”的历史内涵。对于写作者来说，他们的写作就是在试图找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病症的“根源”，甚至企图开出根治的“药方”，书写/记录“乡土真实”也因此逐渐被归入不同类型的社会议题中。

《梁庄十年》中，梁鸿称其较前2部“梁庄系列”作品更具有“非虚构”的特征，因为她“试图关注那些低入尘埃中的细节和存在”<sup>[9]</sup>。梁鸿认为《梁庄十年》终于具备了较为完整的非虚构作品的文体形态，这使她以更为自在的姿态进入到“梁庄”内部，不再是以“问题”对应“现实”，而是以“个人的历史”来拼贴出对“乡土中国”的隐喻式的历史图景。这部作品更多时候在描述梁庄发生的大小事，梁庄里的众人便是故事的线索，加上小说式的对话还原，整部作品的形态更接近“小说”。但故事里的人与他们的经历却是真实的，这显然是梁鸿探索“非虚构写作”文体的一次尝试。借助“小说化”的叙事，把属于梁庄的“历史”与个人的生命经验相互对应，使非虚构叙事成为了一个个历史镜头的闪回和交错。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试探“非虚构”与“虚构”边界的过程中，“梁庄三部曲”初步划定了非虚构写作的文类疆界。梁

鸿笔下的“梁庄”常被看作是当代乡土中国研究的新范本，成为与费孝通的“江村”、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及于建嵘的“岳村”等同样受到乡土社会研究关注的存在<sup>①</sup>。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的社会学理论论断及框架——诸如“差序结构”“基层社会”“血缘与地缘”等隐在或显在地出现在“梁庄书写”中，成为梁鸿最重要的结构性支撑之一，但这也恰恰是“梁庄三部曲”的局限所在。正如在《梁庄十年》中，抛开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辨性冲动，梁鸿还是试图从“文学/情感”中找到平衡“总体性反思”与“私人化书写”的方式。

但与此同时，“非虚构返乡书写”是最典型的以农村田野调查作为写作基础的作品。由于这些“类村庄民族志式”的非虚构作品依旧还是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文学性表达，因此，便有学者指出，这种“返乡式写作”对于当代中国乡土现实的解读缺乏深度：“就当前‘非虚构’写作来看，这种新闻化、人文化的描述方式，导致文本结构越来越松散，分析力减弱而情感表达被凸显。……这类‘田野调查’文字后来被贬称为‘返乡体’，其原因可以从写法的内在缺陷中获得解释；而内在结构的松散，使得它易于被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所选择和编织，它所被寄望的介入性和自主性便都无从谈起”<sup>[12]</sup>。以“梁庄书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返乡写作，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对传统乡村社会学架构的依赖以及叙事的同质化，使得反思“乡土中国”的理论路径成为必需。“非虚构写作”提供的并非单纯的关于“现实”的叙事模式，而更多的是一种构筑“历史叙事”的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非虚构作品虽然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现实和经验进行细节化的深描和分析，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恢复“文学”回应社会问题的能力，但当代文坛在谈论“非虚构写作”时回应的更多是如何以“文学化”的方式记录“真实经验”以及写作者的合法性的问题，最终所记录的“真实”更多是“风景化”的知识性书写，而非真正进入当代现实叙事的方式。

① 在《中国在梁庄》的出版宣传中，便与“费孝通的江村、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于建嵘的岳村”并列出现，成为当代乡村社会研究的重要材料。



式。因此,如果只是将“田野调查”作为写作合法性的保障,仅仅呈现乡土题材框架内的问题或是故事,“非虚构写作”便无法真正突破既有的知识框架和现代小说的叙事范式。换言之,以“梁庄三部曲”为代表的“非虚构返乡书写”实际上未能真正进入作为“地方”的“乡土”,梁鸿们无法脱离既有的将乡土风景化的知识模式来想象“乡土中国”,对于他们来说“乡土”意味着“故乡”,意味着作为总体的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边缘场域”或中国城市化试图收编的空间。因此,要走出“乡土书写”的“困境/围城”,便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构筑关于“乡土”的知识,因为“乡土”并非只有村庄之中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与“村庄”的关联,“乡土”也同样关涉地方性文化历史、自然风物乃至作为整体的乡村时空秩序的内涵与外延,这些都为讨论城乡问题的现代性叙事所遮蔽。因此,“非虚构返乡书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从乡村现实层面叙述作为整体的“乡土中国”故事的可能;另一方面也重新打开新的叙事视野,讲述“乡土中国”并非只是感性叙事或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典型塑造,它本身具有多重知识面向和理论维度,通过“非虚构写作”尝试打开的这些多元面向反过来也将形塑文类自身的叙事机制与写作范式。

## [参考文献]

- [1] 《人民文学》编辑部. “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启事[J]. 人民文学, 2010(10): 208.
- [2] 梁鸿. 中国在梁庄[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3] 梁鸿. 出梁庄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3.
- [4] 梁鸿. 梁庄十年[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2: 233.
- [5] 李敬泽, 陈竞. 关于非虚构答陈竞[J]. 杉乡文学, 2011(6): 74-75.
- [6] 李洱. 梁鸿之鸿[J]. 扬子江评论, 2018(1): 34-36.
- [7] 詹姆斯. 政治无意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6.
- [8] 李云雷. 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 “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J]. 文艺争鸣, 2011(3): 38-42.
- [9] 梁鸿. 梁庄的空荡荡的家[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2(4): 39-42.
- [10] 王磊光. 呼喊在风中: 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
- [11] 杨胜刚. 黄灯《返乡书写》的精神历程[N]. 中华读书报, 2017-06-28(7).
- [12] 刘卓. “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及局限[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8(1): 113-120.

## The Dilemma of and Opportunity for Non-fiction Writings on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China: Centered on Liang Zhuang Trilogy

WU Qiong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Liang Hong's Liang Zhuang Trilogy tells the story of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with the attitude of the intellectuals returning home, which has shaped the important theme pattern of non-fiction writings on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entering the real rural space through non-fiction writing, Liang Hong gained the legitimacy to re-enter rural China, but because of observing and writing this sample of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humanities knowledge, Liang Zhuang Trilogy does not really provide a new paradigm for imagining rural China. On the contrary, both Liang Hong's and other intellectuals' non-fiction writings on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have fallen into a similar predicament. This dilemma provides an entrance for reflection on the local world as a problem in multiple disciplinary dimensions and becomes an opportunity for non-fiction writ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humanities knowledge and explore more genres.

**Key words:** non-fiction writing; Liang Hong; writings on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rural China

(责任编辑 张永汀)